

国学人物



穷经究史工于辞章的经学大师

皮锡瑞(1850—1908)闻名于后世,首先是在1898年应湖南维新官绅黄遵宪、熊希龄的邀请,受聘担任南学会会长,大胆宣传维新变法;其次是他晚年为新学堂编撰《经学历史》《经学通论》,不遗余力地宣扬今文经学,并成为中国经学的入门读物。至于皮锡瑞的生平详情、思想实况与学术真貌,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。皮锡瑞生前享有盛名,身后却湮没无闻,虽然可归因于时代嬗变与旧学衰落,却与他的各种著述分散难稽,遗世稿本秘藏难睹,《师伏堂丛书》艰深难懂等大有关系。

国内外研究者评述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思想,大多依据《经学历史》《经学通论》,个别学者注意到《今文尚书考证》或是《孝经郑注疏》,由此强调他的今文经学立场。现在根据《皮锡瑞全集》,他的全部经学著作中,有《易》类1种、《书》类6种、《礼》类2种、《春秋》类3种、《论语》类1种、郑学类9种附2种、通论群经类5种,可见他博涉群经,成就极高,特别是在《尚书》和郑玄之学的研究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。

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,皮锡瑞

从小接受吟诗作文与读史发论的训练,因此工于辞章,娴熟史传。他年少即以文才出名,尤其擅长骈文,喜欢用骈体撰写史论,辞藻工而议论精,谈古论今,才识往往高出一筹,正如他在日记中回忆:“抗论时事,盱衡今古,鄙宋、明之贫弱,慕汉、唐之富强,少作诗文,多是此种议论。”(《皮锡瑞全集》第10册第833页)然而,皮锡瑞的文学才情与史学见解,不幸被他的经学成就所掩,迄今不受学界重视。

皮锡瑞的诗词文章,多为叙事、抒情、写景、纪游、咏史、论古之作,既记下个人的见闻,感受与思想,也折射出晚清波瀾壮阔的时局与新旧扰攘的世情,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,也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。例如,《师伏堂骈文》收文60多篇,无不骈散交错,文辞清丽,典故庄雅,辞气温厚,议论风发,情蕴渊懿,诵之朗朗上口,思之思绪纷飞,尤其是将经义与辞章冶于一炉,使史论与时事紧密贯通,让人击节叹赏,李肖聃即在《湘学略·鹿门学略》中赞叹“林、苑不能分传,经、文乃合一途”。王先谦辑刻《骈文类纂》时,收录皮锡瑞骈文11篇,在所录8位湖湘文章名家中位居第二,仅次于周寿昌(收文14篇),而多过王闿运(收文10篇),足见皮锡瑞骈文成就之高、影响之大。

经典品读



《周易》何以成为群经之首

在中国古代经典中,《周易》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,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。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,《周易》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,直到西周初期卦辞、爻辞才编定完成。《周易》经文的形成和内容确定之后,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,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,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。真正促使《周易》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,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,则是《易传》(十翼)的出现,这也标志着《周易》经典最终完成。

以“六艺”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了无以撼动的正统地位,兴儒学、重教化的形势则不断把易学推向当时思想文化舞台的前沿。从汉代开始,《周易》被尊崇为群经之首,这一地位的形成,有着深刻的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。

经传合编本《周易》作为儒家特别重要的五种经典之一,因其特有的教化功能,满足了汉代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需要,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。汉儒大都精通易学,同时又热衷探讨掺杂以阴阳、五行、灾异思想的天人之学,“借天象以示威”来劝勉君主,使其怀有忧惧、敬畏之心。《周易》中“观天之神道,而四时不忒;圣人以神道设教,而天下服矣”蕴含的天人之道不仅是汉代天人之学内在的思想渊源,同时也关乎汉儒通经致用之术。汉儒通经致用正是建立在深谙《春秋》与阴阳等灾异学说的基础之上的,体现了汉代经学的重要特色。而《周易》通过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的思维方式,恰恰迎合了汉儒借通经致用而享有干禄地位之资的需要,遂成为他们不断引经立说的理论根据。

《周易》在汉代居于儒家经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国学荐书



《唐诗的读法》

作为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,唐诗当然有着不同的读法。买一本《全唐诗》,皓首穷经将它背得滚瓜烂熟,是否就意味着读懂了唐诗?长篇随笔《唐诗的读法》,阐述了诗人四川对唐诗的另一番理解。他认为,读唐诗,不能把古人供起来读,而应以同代人的立场去理解唐代诗人所关心的问题,理解他们创作的秘密何在,思考“古人为什么这么做”。“只有当我们深入古人之间,看他们互相争吵,这时,古人才能活起来”。这应当也是唐诗的另一种读法。

有一些文字,虽然历经沧桑却美丽如初;有一种文化,虽然跨越千年却魅力不减。近日,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立夫做客国学讲座,带领大家跨越千古的沧桑,探究《论语》中的人生智慧——

学好《论语》三大智慧 铺就人生成功之路

文/本报记者 许珂 图/本报记者 王翟



刘立夫

《论语》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。它以仁学为核心,深刻阐发了为人、为学、为政三位一体的智慧,是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。它穿越了两千多年历史隧道,至今不仅未减其色,而且历久弥新,正在重新焕发蓬勃生机。近日,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立夫做客国学讲座,带领大家跨越千古的沧桑,探究《论语》中的人生智慧。

《论语》智慧之一 学习是知识经验代代相传的惟一途径

儒家学派重视个体的自身修养,其人生发展规划是: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而修身就是通过学习来培养自身素质,把修身排在第一位,也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学习对于个人素质的重要性。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,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置人格培育于知识教育之上,提出教育的目标在于“学以成人”。

《礼记·学记》有:“玉不琢,不成器;人不学,不知道。是故古之王者,建国君民,教学为先。”其意思是玉不加琢磨,不能成为器物;人若不学习,亦不会明白道理。因此,古代的君主建立国家,治理民众,都把教育当做首要的事情。清初大才子金圣叹回答别人问他不做官的原因时,曾说:“学而第一,为政第二。”金圣叹用为政做官来与学习比较,强调学习的重要性。

《论语》的开篇就是关于学习的,劝解人们学习了新知识,要时常温习它,把好的行为当成是快乐的源泉。其后孔子在《论语·为政篇》里提到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他的意思是:我十五岁就立志学习,三十岁说话做事有把握,四十岁就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迷惑,五十岁就能够得知天命,到了六十岁,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辨真假、判断是非,到了七十岁,便随心所欲,任何念头都不越规矩。孔子以自身的经历来说明必须重视学习,劝诫人们要在年轻时立志学习,不断增加自己的学识,慢慢地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,这样才能做到“三十而立”“四十而不惑”。

同时,孔子还强调“学”。他认

家风传承



苏门三父子 情操昭千秋

——读书正业、清正廉洁的苏氏家风

“一门父子三词客,千古文章四大家。”这是眉山三苏祠门口的一副楹联,这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。苏门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,传为千古佳话。

孝敬仁爱 读书正业

三苏家学源远流长。苏洵是战国纵横家苏秦、西汉关内侯苏武、唐代宰相苏味道后代。在苏洵撰写的《族谱后录》中,祖父辈的事迹历历在目。苏洵的祖父苏杲,乐善好施,孝顺父母,友爱兄弟。无论是亲朋还是乡邻乡亲,都爱戴敬仰他。苏洵的父亲苏序,也是仁爱热忱之人,在饥荒年代常常拿出粮食无偿地救济灾民。

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,也就是

1009年,苏洵出生,这时候,苏氏已在眉山繁衍三百余年。苏洵,字明允,号老泉,是大器晚成的典范,《三字经》中说,“苏老泉,二十七,始发愤,读书籍”。早年的苏洵,四处游学,27岁时,幡然醒悟,开始发愤读书,同时广泛结交有学问的师友,增加见闻和人生经验。十多年后,终名扬京师,成为一代大家。

程夫人,苏洵之妻,苏氏兄弟的母亲。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,可以看出程氏的早期教育对苏轼、苏辙两兄弟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
苏轼的《记先夫人不发宿藏》讲到程氏夫人故事,传达的不仅仅是修养,更是一种廉明公正人生观的身教。

兄弟同契 家风永传

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至今在



“利”时,不会因为物质的诱惑,而迷失自我。儒家并不一味地反对追求利欲,但更注重的是,在获取物质利益时,要“见利思义”,对物质的追求要符合道义,不按照道义而取得的利益对孔子而言是不屑一顾的。

“礼”是君子衡量言行举止的重要标尺。中华民族,礼仪之邦,君子言行举止要特别符合礼仪规范,“不知礼,无以立也。”在日常生活中懂得为人诚恳,尊重他人,懂得谦让,这样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,立足社会。相反如果行为处事不遵礼制,就会带来危害。

其次,做人要讲究孝道。

孝道是社会伦理的核心思想,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。《论语·为政》记载:“子游问孝。子曰:‘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;不敬,何以别乎?’”在此,孔子认为孝不仅仅是养活爹娘,简单满足父母的衣食住行,如果对父母没有敬重之心,就跟养狗养马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,孔子提出了以“敬”为核心内容的孝道,强调对父母的孝要建立在对父母物质上的满足,更包括对父母人格上的尊重和精神上的慰藉。

同时,在孔子看来,孝敬父母还必须做到不违背父母的意思,要做到“事父母几谏,见志不从,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。”大意是说儿女侍奉父母时,如果父母有什么过错,要委婉劝阻,和颜悦色,即使自己的意见没被听从,仍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,虽然忧愁,但不怨恨。这是孔子在强调子女对父母还要孝顺,顺者为孝,必要时给予父母一些生活习惯和爱好上的包容和尊重,让他们精神上能够愉悦,才是真正的尽孝。

再者,做人还要求交友之道,主要是对朋友的选择、对朋友的态度、与人相处等几个方面。

《论语》中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交友原则:亲近益友,远离损友。鼓励人们要多结交那些正直、守信用、知识广博之人,而远离那些虚伪奸诈、自私自利、阿谀奉承、夸夸其谈、言过其实之人。在交友态度上,要听其言而观其行,不能朋友说什么就是什么,要看他是如何去做的,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朋友的为人,交到可靠的朋友。当面对朋友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时,应该做到忠告而善道。

最后,做人还要有修养之道。

孔子主张在品行方面不断完善自己,达到做事恭敬认真谨慎,通过修炼自己,达到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的境界。加强道德修养就必须不断地反省自我,即“自讼”,在此过程中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,多从自身找原因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。

《论语》智慧之三 为政者要用“德”来理政,要有仁爱之心

孔子提出“为政以德”的从政标准,主张以仁爱为本,礼法兼用,为历代执政者提供了一套理想的“善治”蓝图。

《论语》中关于“理政”的内容占了不小的一部分。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多数都读过《论语》,很多人都有意识地

利用《论语》中的思想来治理国家。北宋宰相赵普曾对宋太宗言: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”故《论语》中的为政智慧,有必要进行总结。

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孔子曾多次提到要用“德”来理政,“德”即美德,其乃心中最真实、最可凭而又不可掩之物,为为政之枢机,为政以德,不施苛政,则民从之。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孔门政治理想,主德化,主礼治。“为政以德”并非不用“法”,“法”亦为“为政”所不可或缺。汉武帝时,虽有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但当时实际上施行的是“外儒内法”,当时的治国方法,是儒、道、法三家融合后形成的。如何“为政以德”呢?有言: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。”即临事谨慎专一,守信爱用,节约财务,以爱人为念,使用民力,要顾及他们的生产时间。此即为“为政以德”的一些具体表现。

“礼”同样是《论语》中很重要的概念。春秋时期,礼乐崩坏,周王朝四分五裂,正是在这个时候,孔夫子奔走于各国,呼吁各国国君恢复古时礼乐制度。他认为这样的话,战乱将会得到平息,周王朝将重新“郁郁乎文哉”。然而,他在许多国家碰了壁,他的治国思想也并未充分得到施展。纵然如此,“治国以礼”的思想也值得我们借鉴,“能以礼让为国乎,何有?不能以礼让为礼,如礼何?”为政以礼,要求为政者首先要约束自己,不做越矩之事。有子曰:“其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鲜矣。”要想治理好一个地区,乃至整个国家,首先要约束好自己,“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”此外,以礼待人亦十分重要。这样,一方面可以赢得民心,一方面有利于自己地位的巩固,同时亦有利于自己各项政策的推行。子夏曾言:“贤贤易色,事父母能竭其力,事君能致其身,与朋友交,言而有信,虽曰未学,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身为一个为政者,其性格亦十分重要。《论语·雍也》中有这么一段话,“季康子问:‘仲由可使从政也与?’子曰:‘由也果,于从政乎何有?’曰:‘赐也可使从政也与?’曰:‘赐也达,于从政乎何有?’曰:‘求也可使从政也与?’曰:‘求也艺,于从政乎何有?’”季康子问孔子的问题是孔子的三个弟子子路、子贡、冉求可否从政,孔子的回答都是肯定的,而且他对每个弟子的性格评价都各不相同,子路断决如流,子贡目达耳通,冉求多才多艺。孔子认为,他们三个都可以轻松地管理政事。

做一个杰出而卓越的为政者,其性格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点就是“仁”。孟武伯问孔子,他的三个弟子子路、冉求、公西华是否做到“仁”了,孔子的回答都是“不知其仁也”。但是,孔子同样对三个弟子的政治才能予以肯定。“仁”,是孔子子弟的终极理想。孔子的三个弟子并非不仁,“仁”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,孔子的三个弟子都表现出了“仁”,但他们所表现的,并非“仁”的全部。身为为政者的人,需要去求仁。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

(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